

查得少、判得轻，难以从根源上消除贿赂犯罪

反腐无死角 行贿一起查

本报记者 杨文明

核心阅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当前，相对于“打虎拍蝇”严查受贿犯罪，行贿者被追究刑事责任者要少得多，为何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受贿行贿一起查，如何查？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

新闻看法

行贿犯罪查得少、判得轻，公职人员和党员行贿更多被追究

自2015年以来，云南昆明市双安公司法定代表人谢某、负责人王某利用建设“都市农庄”的名义申请渣土调拨点，以此违规接纳渣土获利。为此，谢某和王某贿赂昆明市五华区涉及运输、倾倒渣土流程中具有审批、监管、处罚等管理权的相关部门领导，使违法倾倒渣土一路“绿灯”无人管理，造成了400多亩土地被非法占用，经济损失超过420万元。案发后，五华区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对10名受贿的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同时行贿人谢某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缓刑两年，目前检察院正在抗诉中。

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2015—2016两年间全国法院公开的一审受贿案件裁判文书8100多件，而同期公布的全国一审行贿案件仅3200多件。

这一结果在实地调查中得到印证。除了少数地区能够查到追究行贿者刑事责任的案例，想要找到追究行贿者刑期的案例并不容易，不少行贿者要么被免于刑事处罚，要么被判缓刑。此外，受贿案件从纪委“两规”到法院宣判，案情和刑期对公众披露相对更为充分，而行

贿案件不管是宣判还是公开，相对更少。西部一位刑辩律师告诉记者，据他了解该省因为行贿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期最长的仅8年。

记者在昆明市和曲靖市两地采访发现，并非所有行贿行为都被轻处理。“在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公职人员和党员行贿都得到了查处。”曲靖市麒麟区纪委案管室主任杨家瑞说。实际上，不少贪腐案件，为了查处受贿者，纪委才调查行贿行为。由于纪法分开，纪委将受贿等案件移交给了检察院后，是否严格追究行贿者刑事责任属于检察机关的职权。不过，杨家瑞坦言，在腐败频发、多发的工程建设领域，处理受贿的相对较多，处理行贿人员相对较少。

行贿者如实供述可从轻处罚，造成行贿犯罪成本低，难以从根源上消除贿赂犯罪

很多基层检察官向记者反映，行贿者除了谋财，还有一大类别属于买官。这类人多是公职人员，纪委一旦在办案中发现行贿行为，纪律处分在

所难免。不过想要追究行贿者刑事责任，需要通过司法程序。

杨家瑞告诉记者，工程建设领域受贿方多为手握一定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公平正义、经济健康发展的影响更为深远，为争取行贿人员配合，会对其采取宽大处理措施。“在实际操作中，工程承建方在调查中大多数都能积极配合调查，且主动交代相关问题，符合从轻处理或不处理的条件。”

云南省师宗县县委书记雷龙应表示，由于行贿受贿属于对合犯，部分受贿行为收取的是现金，在调查取证上存在一定难度。为有效查办案件，纪检、反贪等部门在查处行贿犯罪时，除情节特别严重外，只要如实供述犯罪行为，一般对行贿者都会从轻甚至免于处罚。“长此以往，就会给行贿者一种行贿不是犯罪的假象，造成行贿犯罪成本降低，尝到甜头后行贿者会更加肆无忌惮，从而难以从根源上消除贿赂犯罪。”

不过即便进入司法程序，也并不意味着行贿者个人将被严厉追究。师宗县检察院检察长唐俊鸿介绍，在此前案件查处过程中，由于不少行贿者是单位负责人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在追究其刑事责任过

程中适用的罪名为单位行贿罪，起刑数额标准要远高于个人行贿罪。这是实践中出现受贿者被判刑，而行贿者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胡乐介绍，“不少受贿案件是由于行贿者揭发检举引发，在索贿案件中，受贿者主观恶性大，行贿者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有的还属于被迫行贿，也会出现行贿者被轻判的情况。”刘胡乐表示，“行贿受贿本来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只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公职人员受贿打击得更严厉。”

成立监察委将有助于纪委和检察院工作的衔接，提高对非党员行贿者的打击力度

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必须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云南省罗平县县委书记侯开苑表示，对行贿对象的处罚较轻甚至免遭刑责，实际上变相鼓励了行贿行为，“部分行贿人肆无忌惮，想方设法把党员干部‘拖下水’，在我们查处过的案件中，就不乏党员干部‘被行贿’，最

后受制于行贿人的情况。”

五华区纪委书记马汝恒表示，只有行贿和受贿一同严惩，才能构筑起一道全民防“贿”的大堤，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行贿行为如何定罪量刑都有明确规定，提高行贿打击力度更重要的是要严格落实相关法律规定。”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提高打击行贿力度已经成为基层执纪执法者的共识。

昆明市官渡区纪委副书记魏东认为，行贿犯罪是一种谋利性犯罪，惩治行贿犯罪，既要受贿行贿一起查，也要追缴甚至重罚行贿者的非法所得，才能在惩治和预防行贿犯罪中发挥应有的震慑作用。

实际上，如今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已成为招投标、政府采购的必经程序，行贿者的犯罪成本正逐步提高。刘胡乐认为，让行贿者“不能行贿、不敢行贿”，才会从源头上杜绝腐败。

“受贿行贿一起查，并不是对打击受贿的弱化，而是补齐打击行贿的短板。”中国政法大学国家监察与反腐败研究中心教授王敬波表示，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将有助于纪委和检察院工作的衔接，提高对非党员行贿者的打击力度。

在受贿犯罪过程中，不少行贿者往往采取现金方式，行贿者口供为给受贿者定罪的关键证据。实际上，严格追究行贿者责任，无形中确实提高了获取行贿者口供的难度。“但这可以通过调取书证、物证等手段来弥补。”王敬波说。

社区安全，心中有『数』才有底

本报记者 颜珂

“辖区内安全生产隐患有哪些，心里都有数吗？”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这并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乡镇和街道，是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可一方面是相关职能部门各管一摊，衔接协调不易，另一方面则是监管力量少、事情多、任务重，监管盲点、漏项难以杜绝。面广，点多，责任大——安全生产任重而又难管的尴尬，长期困扰基层。

在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辖区内3389家生产经营单位的所有安全隐患，全部“装”进了信息平台。学士街道安全生产全域监管指挥中心，街道工委书记罗政手指墙上的大屏幕，“安全隐患有多少，哪些已经整改到位，哪些还没到位，这里都能实时掌握。”

让安全隐患“看得见”“摸得清”，能第一时间治小患、防大祸——学士街道的探索，为“最后一公里”的安全监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打开方式”。

学士街道斑马塘社区，一家1700平方米的健身中心即将开业。可学士街道专职安全员邓康发现，这里既没有配齐消防设施，也没有通过消防验收。这条安全隐患信息，被他用手机上传至街道安全监管云平台。

通过云平台，信息几乎同时被发送到消防等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手机上。一天之后，健身中心被勒令暂停营业。

今年6月，邓康和其他41名同事一道，成为湖南省首支专职安全员队伍中的一员。专职安全员隶属街道，各领一片责任区，每天拉网式排查辖区内所有安全生产事项。

246家门店，6个楼盘，8个在建工地，这是邓康责任区内的检查对象。经过系统培训后，他每天的任务就是上门“找茬”——对照工作手册，一一检查，哪里不符合要求，立马上报。“事情看起来小，但能及早发现，可能就能避免大事故。”邓康说。

街道安全生产全域监管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一个醒目的红点冒出。鼠标一点，弹出一项新的安全隐患。学华村的一处液化气供应站仓库，虽然装有可燃气体浓度报警器，却没有接通电源，也无人值守。专职安全员在安全巡查时发现，立马上报指挥中心。

信息被同时发送到相关职能部门。当天下午，街道城建办联合学华村安全员上门调查核实，并迅速向岳麓区燃气管理部门上报。几天后，一份整改通知书发到了该液化气站点，限其5个工作日内整改到位，否则将依法进行取缔。

在学士街道安全生产全域监管指挥中心，这样的安全隐患至今已累计处理了193个——从信息收集、反馈再到整改，链条式的工作流程全部在信息化平台上高效完成。

学士街道食安所所长史习伟每天都要盯着手机查看云平台传递过来的报警信息，并随时准备处理。云平台今年8月正式上线运行，他的工作量也因此而陡增，“现在每天的步数都在2万左右。”

“系统运行以来，需整改隐患清单包括：食品安全341个，消防安全157个，文化教育安全26个……”平台大屏幕上，一本覆盖全辖区的安全生产隐患工作台账清楚呈现。

学士街道的“安全家底”，从未这样清晰。明晰了安全隐患清单，也就压实了安全责任。基层工作人员借助云平台提升了检查效率，驻街职能部门在云平台上的工作情况，也会定期报送上级领导机关。基层安全监管的“单打独斗”，逐步变为大安全格局下的“集团式作战”。

罗政告诉记者，下一步，街道将在云平台大数据分析上着力，“比如，按安全隐患的属地、类别进行分析，针对突出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甚至为上级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政策建议。”

四川宣汉以大党建促进大发展 基层组织引领走出脱贫新路

孟祥夫 杨倚天

四川达州市宣汉县围绕“大党建引领大发展”理念，聚焦“基层一线”，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走出一条脱贫新路。

基层党组织是脱贫攻坚的一线决策站和指挥部，宣汉县委以清单强家、活动旺家和产业发家“三大计划”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县委制定严格的基层党建标准、党建工作任务清单和年度目标任务，压实两级党建工作责任。同时，推行片区现场推进会制度，在选取的乡镇逐村检验党建促脱贫工作成效，倒逼基层组织紧起来、动起来。

县委在要求基层党组织定期组织党员过好党内政治生活的同时，着力办好农产品代销等活动，让脱贫路径多起来。同时打造28个产业党建促脱贫示范点，吸引工商资本、社会资本与村集体合作发展乡村旅游、现代农业等项目，带动全县340余个村特色产业快速发展、集体经济取得突破。

党员干部是脱贫攻坚的执行官和排头兵，宣汉县委以党员提能、示范和温暖“三大行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根据各乡镇发展实际，配齐配强脱贫攻坚乡村两级“班子”，做好第一书记轮换和非贫困村第一书记选派工作，补选能力优秀、敬业奉献的干部，并分层分类轮训。

群众是脱贫攻坚的主人公和受益者，县委在贫困村推行“积分管理”制度，根据评分高低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激发群众脱贫的信心。同时在村级活动阵地成立农民创业就业指导中心，为党员群众提供小额信贷、专家咨询、劳务供需等服务。建立“技能培训+岗位开发+创业带动”智力扶贫模式，依托“农民夜校”，举办“扶贫专班”“乡土人才实训班”，引导贫困群众自主创业。

宣汉县委书记唐廷教认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党，核心在人。只有强化组织“引”的功能，提升党员“带”的实效、激活群众“跟”的动力，才能让广大群众早日脱贫。

江苏张家港推行电子证照共享应用 一千多个事项取消收取身份证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本报南京12月21日电（记者王伟健）记者日前从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务服务办公室获悉：从2018年1月1日起，张家港市域范围内的户籍人口、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本市办理政务服务事项、便民服务项目、公共服务事项等1000多个事项时，不再需要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直接由受理部门读取身份信息后，从电子证照共享平台核验并调取信息进行复用。新的审批事项办结后，发放纸质证照，同步生成电子证照，导入电子证照库，方便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也方便企业群众后续办事。

目前，张家港已经建成了“一网两库两平台”。一网指江苏省政务服务网张家港站；两库是指苏州市电子证照库、张家港市法人库；两平台指张家港市政务服务管理平台和电子证照共享平台。“一网两库两平台”是支撑电子证照的共享应用的数据信息和技术体系。据介绍，按照项目计划，今后1—2年内，张家港市将实现各行政机关所有证照的归集，全面建成张家港市电子证照库，逐步实现与上级部门平台的对接，建成资源集成一体化、平台运行协同化的证照共享应用服务体系。



当地时间12月21日10时许，执行“和谐使命—2017”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圆满完成对东帝汶为期8天的友好访问和人道主义服务，启程回国。和平方舟首次访东帝汶，医院船通过医护人员码头调控分诊、导医人员协助送诊、专用扶梯快速送诊等，提升诊疗效率，尽可能惠及更多民众。

图为医护人员向前来送行的人群挥手告别。

江山摄（人民视觉）

起航

山西晋城军地百人宣讲十九大精神到基层 谷场当教室 炕头作讲台

本报太原12月21日电（周亚军、刘洋）为了打通宣传十九大精神的“最后一公里”，山西晋城军分区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军队走在前列”的重要指示精神，日前组建了一支军地“百人宣讲团”，按市县乡镇地域进行网格化宣讲，将十九大精神送到千家万户。

军分区宣讲十九大精神的计划，得到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和积极响应。为解决军分区部队宣讲力量不足，地方人员军事知识掌握不够的问题，军地双方资源共享，理论宣传队伍由优秀军官、专武干部、民兵骨干扩展到各级党政领导干

部、党校、地方高等院校专家教授，受众群体也从部队官兵、民兵拓展到广大干部和普通百姓，实现了讲师队伍“军地延伸”，受众群众“全员覆盖”。

该市军地联合组成的103名讲师，带着十九大精神宣讲资料，分赴田间地头、社区农村、驻市部队，把谷场当教室，把炕头作讲台，第一时间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传播到基层一线。活动开展以来，宣讲团走乡串村累计行程1500多公里，举办讲座23场次，送课下乡96堂，帮助官兵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69个，听众2.1万人次。

三次约谈石沉大海

中消协申请对酷骑公司立案侦查

本报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齐志明）近日，根据消费者反映和前期调查情况，中国消费者协会、中消协已向全国公安机关举报，举报酷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酷骑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涉嫌刑事犯罪，申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今年8月下旬以来，酷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因押金、预付资金退还出现严重问题，并先后关闭网上、电话等退款通道，导致消费者大面积投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见本报12月13日、15日相关报道）。自今年11月23日以来，中消

协不断收到酷骑单车消费者来信，要求退还押金、预付费，控告酷骑公司涉嫌集资诈骗等。到12月21日，中消协已收到全国各地消费者请求诉讼信2064封。

今年3月、9月和12月，中消协曾三次约谈酷骑公司，要求说明情况，对方始终不予回复。中消协曾派工作人员前往位于北京通州区的酷骑单车总部实地调查，发现该公司办公地点已人去楼空。中消协委托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对其宣称的位于四川的退押金场所进行调查，发现该房屋系私人产业，酷骑单车并未与房东达成租

赁协议，现场也无法找到公司相关人员。由于酷骑公司所发通知不实，误导大量消费者不断前往讨要押金。

今年12月12日，中消协向酷骑公司发出公开信，要求酷骑公司依法承担企业及个人应负的法律义务，并向消费者公开道歉。但酷骑公司及主要负责人至今仍未露面、不联系、不回应。中消协认为，酷骑公司的行为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我国法治权威。

酷骑公司将权属他人的押金挪用，造成巨额资金去向不明，涉嫌构成非法侵占、职务侵占等刑事犯罪行为。为避免消费者遭受进一步损失，中消协已于近日依法履职，向有关公安机关举报，申请立案侦查。